

Opinion

Observer | 上证观察家

内需究竟该怎样启动并扩大

◎周洛华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启动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目标,这是党中央针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成熟和自信。

其实,有关内需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了。我记得最早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启动内需的口号,是在1998年,当时刚刚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政府及时提出了启动内需的政策。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出口的快速成长,而国内的需求更多地体现在舆论上。

10年前,我国政府启动内需的主要举措是发行国债,力推基础设施建设。这可能是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启示。我从来就不认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启动内需并不能依靠政府开支。政府增加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投资基建或者其他开支并不能促进国内需求,相反将抑制国内的需求。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政府花出去的钱都比市场更有效率,我们只能肯定政府花钱的同时,不仅挤占了居民的消费开支,更会使得物价不合理地上涨。政府税收收入不仅减少了居民或者企业相应的收入,而且挤占了本来应该属于纳税人的资源。因此,我希望政府不能再次从增加政府开支的角度来启动内需。

启动内需有几个关键的措施需要落实,首先是税制改革,这是重中之重。我国现有的税收制度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保护企业,因为

我们只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才能确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位,使我们获得买方地位。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必须严肃考虑中国市场对其国内产业的影响时,我们才可以说真正建立了一个内外需平衡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

他们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的地方留存部分。我们看到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保护工作都是由一个非官方组织“消费者保护协会”来进行的,而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消费者的利益和企业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是保护企业利益。如果我们把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地方政府就会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我们就会看到地方政府更积极地保障产品质量监督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举措。无理由退货曾是十年前就提出的口号,到现在也没有在全国范围落实。这不能不说是因为缺乏利益驱动来保护消费者。如果地方政府像招商引资一样热情地对待消费者,内需可能很快就启动了。而且,把增值税从生产环节改为到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其税收征管的成本也降低了,并不会引起政府收入的减少。

除此之外,还应该降低一系列税收负担。其中包括:关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等等。关税的降低有一系列的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扩大内需,我国市场上购买一件品牌服装的价格大约是国外同类商品的2倍,主要的原因在于关税和增值税。大家不要以为降低了关税就会导致中国就业机会的流失。我国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基地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非常强劲。所以,增加进口商品只会增加国内的需求,而且大部分国内销售的进口商品的增值部分是给服务员创造了就业机会。一个国家的商业如果繁荣的话,其房地产价格也会在相对比较稳定,这是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国政

府提出了平衡国际贸易收支的目标,但实际上我们执行的却是对出口商品退还大部分增值税的措施,对国内消费却征收17%的增值税,这显然不是鼓励消费需求的措施。因此,我建议,在增值税转型为消费税之后,进一步降低消费税的税率,这样才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可能有人质疑这样做将导致政府福利减少,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消费启动之后,国家征收消费税的税基扩大了,不是反而能够促进政府的收入增加吗?

最后,提高社保福利也是促进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覆盖面还不够宽,这正是政府需要努力改善的地方。增加居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将免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释放消费需求,这就能够从长远保障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转型。

我最近在思考美国的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之后,还有那么多国家愿意购买美国的国债,帮助美国渡过危机呢?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具消费能力的大市场。我们只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才能确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地位,使我们获得买方地位。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必须严肃考虑中国国内市场对其国内产业的影响时,我们才可以说真正建立了一个内外需平衡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当然,我们的消费模式不能建立在过度的信贷消费和超前消费的基础上,否则会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内需成为经济第一引擎时机成熟

◎陈卓

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出口带动增长转为依靠扩大内需以及农村城镇化带动增长,这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从农村市场看,中国有近六成人约8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国家有规模如此巨大的城镇化,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低于城市居民,但是基数巨大,且农村人口的收入也在稳定增长。8亿农村人口的大部分都能达到现在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巨大的。据测算,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至20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今后几年我国城市化将会进一步加快,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此外,农民进城打工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这将促进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推动其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人口是推动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人口大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将使消费从2008年开始进入黄金时代。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消费支出的高峰期一般在40岁至50岁左右,这意味着,2010年前后10年将是我国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现阶段的消费增长正处于高峰期的开端。上世纪60年代的高生育率,使从90年代开始就逐渐

迎来了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扩张。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目前正逐渐度过高储蓄期,消费需求将呈快速增长态势。

据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即将步入第三波消费高峰,而人口出生率和人口结构是影响消费结构的关键。1981年之前出生的独生子女有9000万人,目前正处于收入和消费的上行期,而1992年至1998年出生的独生子女约有3亿多人,也将逐步进入消费年龄,这两代人的消费倾向要远高于储蓄倾向。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从发展趋势看,汽车和住房等消费升级产品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初期,未来10年至15年将是我国经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整个经济总量和规模将上一个新台阶。目前医疗、文化、体育、娱乐、旅游、餐饮、家政、物业管理等消费,不仅所占比重偏低,而且产品与市场十分狭小,预示着居民消费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但也应看到,由于经济周期惯性和宏观调控的时滞性,四季度至明年经济增长可能继续下探,这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经济转型综合叠加的结果。在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下滑、企业负担沉重、居民消费不旺、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扩大内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最需要打出更多的财政组合拳来刺激经济发展。其中增收减负,提高居民购买力是当务之急,减负的重点是减税。

扩大消费拉动内需,首先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落实补贴政策,增加对中低收入者、困难群体的生活补贴;继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

国家免征利息税,这对鼓励消费和投资、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增加个人储蓄存款收益,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未来财政政策有更大的发挥空间。1998年前后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加大基建投资为重点,而目前扩大财政支出的重点应是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发掘经济内需潜力。具体而言,可加大“三农”、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出,并考虑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提高个税扣除额,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消费领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注意维护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强化收入预期和弱化支出预期,确定灵活的价格机制,给消费者创造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良好环境。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虽然要保持消费持续快速增长非一日之功,但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此外,要努力稳定“一率两市”,稳定汇率、股市和房市。要妥善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巩固经济基本面。目前更重要的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振居民的投资信心,保持投资者的利益,使股市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土地制度改革有助抵御金融危机

◎田立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项看似局限于三农发展的决议,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把土地问题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但当我们站在宏观经济大局和金融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关系绝非牵强。

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危机,美国学者富兰克林·艾伦和道格拉斯·盖尔在本世纪初的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的类型无关,无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另一个结论则有些悲观,他们认为金融危机是绝对的,是金融发展的常态,人们可以做的是如何处理危机,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危害。

既然危机是常态的,那么应对能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考虑的问题。目前多数观点关于应对危机的认知大多是亡羊补牢式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时甚至还是剜肉补疮式的。前段时间全球性的流动性危机,就是典型写照。其实,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抵御危机的能力源自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而这个抵抗力至少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二是国民财富的绝对数量。

关于后者,比较好理解,就拿美国来说,虽然危机源自美国,受冲击的力度也不像我们,但美国经济因此而受到的打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惨”。反过来,亚太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就

不行了,谁都没注意的冰岛甚至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能说和实力没关系吗?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究竟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影响,各方说法不一,但不管说如何,抵御的效果取决于经济体的实力。众所周知,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宏观层面不会有大问题,但人均实力就差多了,国民抵御冲击的能力不容乐观。而短期内人均实力的提升,如果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的话,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农民,这方面的能力恐怕就更差了,土地制度改革恰恰为农民兄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承包权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转化。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流转不流转的问题(过去的土地承包原则上不允许转让),但从价值角度看,是否“流转”的差别可是很大的。一旦土地经营权允许流转了,实质上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了一定的处置权,也就是说,土地虽然还是那块地,但由于农民对它的权利增加了,于是也就增加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资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增加绝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价值的增加决不仅限于微观层面上,从宏观角度看,土地经营权的增值的直接结果是经济体价值的增加。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累加的过程,其内涵可以描述为“一加一大于二”,就好比一桶从未被利用的黄金(价值等于零)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被挖掘出来一样,其价值远大于一般的想象。

不仅如此,土地制度改革对于农业产业化建设也是有利的。过去我们在农业产业化推进

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分散的土地与产业化的经营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曾有人提出用土地经营权资本化的方式解决上述矛盾,但推进起来几乎没有可能,说到底,就是农民手中的经营权几乎没有价值,如何资本化?现在,农民手中的经营权有了更多的处置权成分,增值了!再来谈产业化过程中的经营权资本化问题才算可行。

实际上,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还可以延伸到很多方面,比如农村金融。可流转权的确立,为下一步农民使用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前些年风靡学术界的农村金融问题。但遗憾的是,很多学者的研究(甚至是一些国家级课题)对农村金融的探讨仅限于融资,忽略了一个健康的农村金融体系对整个宏观金融体系安全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经济体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次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宏观经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刻的一项重大利好政策,对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这样的利好消息也能给资本市场上也有所反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土地制度改革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比如,对于处置权的界定,应该尽快从法律层面加以完善,并进一步加大处置权的宽度与深度;另外,处置权的存续期有待进一步延长(至少也要50年嘛),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永佃权制度,从而使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一项长期利好,而非短期行为。

■《上海证券报》联合央视经济频道“直击华尔街风暴”

为什么国际大机构被恐惧所笼罩



李 Xiaojia

我觉得华尔街现在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危机像海啸一样影响如此之广。关键的问题是未来到底还能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没底。我的大部分同事,朋友们,现在既有一种无奈,又有一种焦虑。因为这是整个系统大的危机,它能够真正影响的事情太有限。

华尔街上周最关注的现象或者问题可能是三菱收购摩根斯坦利。摩根斯坦利和三菱都公开明确表示这个项目会继续进行。如果能够成功完成,肯定对市场进一步恢复信心会有很大帮助。现在没有理由相信这个项目完不成。当然市场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美国财政部长伯恩斯已明确表态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切必要的手段现在已经在不像以前那样羞答答的,都已放在可选的方案中了。

我相信三菱的管理层和股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光看今天的股价,而会从长远的角度、从正常市场的状况来看,因为金融海啸使得摩根斯坦利的市值以每天15%、20%的速度在蒸发,这不应该是正常的市场价值。

现在市场的恐惧和大萧条时有很大不同,大萧条时的恐惧,是普通股民在股票市场里面的绝望,今天的恐惧更严重地反映在机构之间。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本来应该是最理智的,最有足够大资源的,能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可他们一开始的行为举止被恐惧所笼罩,因为大家都是股东,都不希望自己的机构被海啸淹没,就像电影院里喊着火了大家都赶紧逃跑一样。

在危机危机的情况下,大家都急着甩卖资产,以降低自己的资产负债率,然后降低融资。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卖的时候是卖不出去的,或者说生产产品本身价格不很清楚。在这里有两类价值,一类价值是属于市场交易的,是大家甩卖,大家贱卖。为什么很多金融机构突然亏损了,突然贬值了,突然资本金不够了?就是这个原因。支持这个原则的人说本来在你的资产上面就不应该放50块钱,或者说那50块钱当初就是虚的。因此今天的50块钱就是市场价值。

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一定是准确地反映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现在的大型金融公司,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一块就是金融资产。从去年开始,中国的上市公司引入了新的会计准则,就是利用公允价值来做报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是自去年沪深股市会暴跌,今年会暴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的会计准则。因为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相互持股,假如我的上市公司

买你的股票,你的公司突然市值涨了,我的公司并没有盈利了,因为有了你的股票,所以马上显示出我的公司盈利了。我的股票在涨,你又持有我的股票,然后你也跟着涨。这样是一个良性循环,但并不真实,导致市值虚高。今年出了问题以后,同样因为相互失控,你的股票缩水,我的也跟着缩水,大家便同时跟着亏损。

当然,这个原则主要在交易资产上实施,而不是简单的投资资产。如果说这些公司以长期投资而投资其他上市公司,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本身是在交易,它的业务就是交易,持有别的公司的股权是它的交易资产,那本身就是水涨船高,水落船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它的价值。

这次在华尔街从一个窗口上把这个危机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在很多大的投资银行的资产表上,到底什么是市场价格特别难界定。因为有两类资产,一类资产是有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大家都在贱卖,都在甩卖,因此很可能大规模降低了原来应该有的价,如按正常的程序买卖,可能不会这么便宜。还有更严重的一部分问题,有一大部分金融资产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怎么办?会计师只利用每个公司的数学模型来推导。现在对于这些大的投资银行的第三级资产,几乎是没有任何价格的,因此对这些公司投资者就卖空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价,干脆就当家。一当家,对这些公司来说就很危险了。

从整个金融危机的相互关系来看,A股从6000点掉到2500点的时候几乎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关系。真正同步的时候是从2500点、2600点的时候朝1900点、2000点掉的时候,这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最近一周的降幅小得多得多。所以,这个海啸没有冲到中国岸边,要论直接的影响,肯定整体信心上波及的影响会继续存在,但不可能大规模地进一步地跟着美国股市缩水。

华尔街最终肯定会再次从灰烬中站起来复活,但是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似乎都困难。现在全球领导人终于认识到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如果弄不好真有可能失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全球一起努力,应该最终能够把这头熊送回窝里,但这其中的代价是什么?成本是什么?长期影响是什么?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如果这次能够恢复起来的话,心理肯定与以往很不同了。80年走了一个迂回,上世纪30年代银证分离,现在又合流。看来新的华尔街肯定是更小的华尔街,负债更少的华尔街。

(作者系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



谷歌新软件 严防“糊涂邮件”

谷歌软件开发人员乔恩·珀洛曾在醉酒后的深夜给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事情后来发展得很糟糕。他因此开发了一个软件,可避免人在酒后神志不清时发送电子邮件。

Column | 专栏
美国一向以自由市场,金融开放来标榜自己。但在经济危机面前,美国人却宁可违背市场的基本原则,由国家接手再注资陷入窘境金融业,也不让外人接手,捡他的便宜。

己所不欲 偏施于人

——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地缘政治



李 Rui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陷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之中,以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作为启动标志,欧洲央行,日本的央行也纷纷行动,一切政策都围绕着重树市场信心,维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上周三各国央行罕见的协同降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各国央行无不把注意力从对通货膨胀的警惕转到对经济增长的维系上。而作为本轮全球通胀的主要推手的原油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随之应声回落。

如果把世界分为三个大群体;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型市场化国家,以及以欧佩克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则这三方之间的新“三国演义”为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提供了有趣的注脚,并对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向世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这次由信用衍生工具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全球爆发的危机和以前爆发在拉美、亚洲,以及俄国的危机非常类似。但是,历史从来不走直线,也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这次危机爆发在最富裕、最强盛的西方国家,美国、欧洲一向以自由市场,金融开放来标榜自己。当年阿根廷,韩国爆发危机,向欧美主导的IMF等国际机构寻求援助的时候,作为获得援助的代价,必须忍受极为苛刻的附加条件,将国内的关键经济政策的制定权力移交给这些国际组织。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近年有了长足进展,但与手中拥有大量石油美元的欧佩克国家一样,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并没有相匹配的增长。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被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国际经济活动的道德典范,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新兴市场国家:“要从边缘国家成为核心国家,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制定者”可以,但是,必须按照我们的规矩来,按照我们设定的节奏进行。”这也是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呼声甚高,而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前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

首席经济学家,与其称之为实质性的进展倒不如说是美国安抚中国的一个姿态。

但这这次美国制造的金融危机,却改变了一切。一个为大众所忽视的现象就是,IMF和世界银行这次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成了火场旁边休息的救火队员。相比之前发生危机时,这些组织的积极行为,岂非咄咄怪事。其道理很简单,美国这个在别人危机时趁火打劫的老手,时刻警惕着别人对他来上这么一手。尽管美国金融体系对流动性的渴望已经到了极致,他们对向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OPEC国家开放自己的金融行业,却是戒心十足。美国绝对不会为了眼前的流动性而饮鸩止渴,拱手让出自己立国之本——金融体系的命脉。尽管危机不断深化,动荡,美国的立法者对主权财富基金(SWFs)购买自身的资产始终耿耿于怀。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对日本的野村证券网开一面。宁可违背市场的基本原则,由国家接手再注资,也不能让外人接手,捡了便宜。这就是美国真实的心态。所以,要力争维护中国和其他拥有巨额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对美元资产的支持。

在看到危机的时候,更要看到危机背后孕育的转机。这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普遍规律。当我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时候,我们更没有理由去悲观,恐慌。这次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构成一个巨大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转机。金融创新本身并没有错,金融体系为主导的高级经济发展形态也没有错。错的是人类的贪婪和监管的缺失。我们绝不能由于眼前的危机,就对以金融为主导的开放经济产生怀疑,从而放慢我国产业升级和金融开放的步伐。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践,结合国际的经济形势,不断地调整在金融上的国家战略,真正做到以我为主,独立自主的发展。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充分借鉴了美国这次危机的经验之后,相信我国经济能够走得更快,更远。我国在国际经济的舞台上,也必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